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

巴黎公社 人民和议会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K565.44/3

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

1950年印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3947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39474

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³/4印张 258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400册
统一书号：11190·067 定价：1.20元

私人笔记和回忆录

译 者 的 话

为纪念巴黎公社一百一十周年（1871.3.18—1981.3.18），我们翻译了这部书。

作者阿尔蒂尔·阿尔努（1833—1895）是一名新闻记者，公社期间被选为公社委员，积极参加了公社的斗争。公社失败后，他流亡国外，在瑞士写成此书，1878年在比利时出版。

本书叙述的史实起于1870年9月3日，迄于1871年5月21日。作者除在扉页上以大字标明“私人笔记和回忆录”外，还多处申明，书中所述均系他亲眼所见，凡属传闻，他都简略地一笔带过。由此可见，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

在公社委员会内部的意见分歧中，作者持少数派观点。本书最大的特点便是他以少数派的观点夹叙夹议，几乎对每一件事，或褒或贬，态度鲜明。作者高度评价公社的事业和公社群众及领导人的英雄气概，字里行间，处处可以看到他热爱公社和人民的炽热之情。作者在书中表述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有许多深刻的、在今天来看仍然是很有意义的见解，但其中不少属于国际工人运动中历来有争议的问题，流露作者深受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需要对之具体分析。

书名中的“议会”(parlementaire)一词令人费解，但根据全书的内容，我们认为这里指的就是公社委员会。因为通译为公社委员会的“委员会”一词在原著中均作 Assemblée，

而这个词的法文原意即为大会或议会。由此推断，所谓人民和议会史，也就是指公社的群众和公社委员会这两者的活动。

本书由许明龙（1—7章、17章）、周以光（8—13章）、张丽（14—16章）翻译，赵克非、许明龙校定；潘爱莲同志也参加了16章的部分翻译工作。所据原著为1878年布鲁塞尔版。原著分为三卷，现合为一卷出版。

译校者水平有限，译文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

1980.8.

原《出版者的话》

大约一个月之前，我们发行了《社会主义小丛书》的第一册。时间虽不长，但足以使我们现在满有把握地说：《社会主义小丛书》绝不会夭折。

誉之所至，谤亦随之。津津有味地读着《半个世界》和《我的妻子吉罗女士》的那个阶级，不能容忍无产阶级也有他们自己的丛书。

《公社人民史》原定是我们这套《丛书》的第三册。我们之所以把它提前出版，不仅是因为时间紧迫，必须刻不容缓地让人民了解1871年那个崇高的创举究竟是怎么回事，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尽快地向国际资产阶级，特别是伪善的比利时资产阶级表明，他们卑劣的诽谤，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可笑，而用藐视和蔑视来回答他们的傲慢，对我们来说又是何等的轻而易举。

公社的历史乃是剥削阶级的一场恶梦！把1871年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告诉1878年的人们，把昔日的特权阶级无耻地在巴黎劳动者的血泊中踱步这幅令人作呕和憎恶的图画，重新展现在今日的无产阶级眼前，这便是我们应该做的事，因为这正是我们的敌人最害怕的。

不错，在“自由”的比利时，所谓的公共安全部门遍布各地，如果本书作者在我们中间，公共安全部就有权把他从这块“自由的土地”上驱逐出去，这实在是愚不可及；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立法者的一时疏忽，这个臭名昭著的公共安全

部却不得不在一位比利时出版商面前甘拜下风，并处于一种十分可笑的境地：在同一个地方，它既眼睁睁看着著作出版而无计可施，却又施出浑身解数想压制这些著作中的言论。

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某个吉日良辰，一部由反动派制订并且是为反动派制订的法律允许把……比利时人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时为止。

但是，眼下我们还是印了这本书。

出版者

前　　言

我想要撰写的不是一部完整的、定型的巴黎公社史。

我孜孜以求的乃是让人们了解这场伟大的人民运动所表明的社会思想，向人们清晰地指明由3月18日所肯定的革命思想的新阶段。

关于这场从4月3日开始，到5月28日淹没在成千上万人的血泊中的战斗本身，已经出版了多种极为详尽的、互为补充的专著。

迄今尚未充分而又清晰地予以确定，今后无论怎样充分而又清晰地予以确定都不会过分的，则是从政治和社会双重角度来看的1871年公社革命的特有性质。

人们着笔较多、描绘较好的是巴黎公社的外貌，即那些不具特色、在所有的起义中都可以看到的悲壮场景，而对于巴黎公社的道德和精神方面，却落墨不多，稍嫌逊色；巴黎公社与先前的一些革命从表面看是相似的，它们的区别正是巴黎公社的道德和精神方面。

这个伟大的、不同凡响的思想，较之其它思想更为丰富，在人民争取权利运动合乎逻辑的演进中，显示出一种崭新的、巨大的进展；它不单要对付敌人的无耻诽谤——无论如何，这是容易对付的——，还要对付一些自称的拥护者对它所作的歪曲。这些人不懂得这个思想，把它曲解成主张集权的雅各宾主义的周期性发作。因此，从道德和精神方面来记述公社历史就更显得必要。

如果 3 月 18 日的革命只不过是雅各宾主义的周期性发作，如果这次革命并未给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被剥削者反对剥削者的战争武库增添一种新式武器，一种因经验教训的磨练和社会科学进步而日臻完善的武器，人们就真的无法理解，这场革命——尽管暂时失败了——何以会使全世界的无产者和善良的人们发出希望的吼声，何以会把昔日最感绝望的人们唤醒，使他们振作起来，进行奇迹般的活动，成为今天满腔热情的人。

如果因为 3 月 18 日的革命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场革命，因而就对它表示赞同，为它欢呼，或对它表示哀悼，那将不免失之于幼稚。

一场革命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发生的日期，而在于它的纲领。

在这一点上，人民并没有搞错；人民之所以忘不了 3 月 18 日，公社的旗帜之所以变成了人民的旗帜，是因为他们完全懂得，这场革命确确实实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十九世纪一连串动乱和探索所寻求的出路，他们终于在这场革命中找到了头绪；当然，那些动乱和探索也并非都毫无功绩可言。

公社究竟是怎么回事？

它的纲领新在哪里？

这个纲领同革命的雅各宾党人的旧纲领区别何在？

在这本私人笔记和回忆录中，我要给读者描述、向读者阐明并让读者一望而知的，正是这些；我将仅仅叙述我亲眼所见，而且尽我所能，做到不偏不倚。

阿尔蒂尔·阿尔努

日内瓦，1878年11月

Arthur Arnould
HISTOIRE POPULAIRE ET
PARLEMENTAIRE DE LA
COMMUNE DE PARIS

Librairie Socialiste de Henri Kistemaeckers,
Bruxelles, 1878.

根据比利时昂利·基斯特麦克尔社会主义出版社 1878 年版译出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原《出版者的话》	1
前言.....	1
一、9月3日之夜——帝国的最后一桩杀人罪——茹尔·费里的兄弟.....	1
二、9月4日——巴黎人民——9月4日革命为什么流产和怎样流产的.....	6
三、政府要员——特罗胥、茹尔·法夫尔、茹尔·西蒙、厄内斯特·皮卡尔、茹尔·费里.....等等.....	14
四、第一次围城期间的巴黎人民.....	28
五、人民感到自己已被出卖—— 10月31日—1月22日	40
六、投降——选举——夺炮——巴士底狱 广场上的示威.....	58
七、巴黎和法国——公社思想的起因和必然性.....	79
八、3月18日	101
九、中央委员会.....	116
十、选举——公社成立.....	139
十一、公社——多数派和少数派——德勒克吕兹、加姆邦、费利克斯·皮阿——政策.....	160
十二、公社——它的法令.....	191
十三、公社——战争，警察，新闻界.....	212

十四、公社——造成软弱无力的其他原因——辞职—— 补选——社会拯救委员会——少数派宣言	237
十五、公社时期的巴黎	268
十六、公社的最后一次会议简述	304
十七、结论	327

— 9月3日之夜——帝国的最后一桩杀人罪——茹尔·费里的兄弟

对任何一次革命，都有三件事要考察：合理性、目的和行动。

六年已经过去了。六年前那光荣的一夜，巴黎人民如同遭到一伙扒手的袭击而被激怒那样，一举把梯也尔和他那帮保皇派的将军赶下了台；这帮家伙身上还带着12月的殷红血斑、9月1日色当惨败和1月28日的泥浆。^①

自那时之后，精神上出现了平静，理智战胜了最初的绝望和愤怒，抑郁而凄惨的流亡生活，象一瓢凉水泼在当初斗争时的狂热激情上。

因此，我觉得自己现在正处在可能有的最佳条件中，可以既不言过其实，又不带任何幻想地表明我的看法。

我现在就公开宣告：这次革命比任何一次革命都更为合理，目标更为高尚。

要想很好地理解3月18日和巴黎公社，事情必须追溯到9月4日和国防政府。

①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在巴黎进行屠杀。1870年9月1日，法军在色当大败，拿破仑三世被俘。1871年1月28日，国防政府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同俾斯麦签订停战协定。——译者

后者是因，前者为果——这只要几页篇幅就能说明。

我只追溯到 9 月 3 日的晚上。

那天，色当溃败的传闻，虽然官方未予证实，却已在人群中悄悄地散布开了。自从宣战和初战失利以来，人心早已骚动不安，此时更是有增无已。

晚上九点多钟，一大队挤得紧紧的人通过蒙马特尔大街，朝巴士底狱走去。队伍中有一些妇女，她们的情绪格外激昂，强烈要求废除帝制。

看见这个场面，我有了信心。六个星期以来，共和社会主义党一直在等待，期望能爆发一场群众运动。我们曾竭尽全力去发动它；但是，象缓冲器一样夹在人民和帝国之间的左派议员牢牢控制着群众，而二十年来的专制独裁和贪赃枉法，也已经使群众萎靡不振，他们对自己的力量似乎丧失了信心，连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这种感觉也不复存在了。

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出现几个市警，成群的人就四处逃奔；在群众集会上，谁也不敢同他旁边的人搭讪，倘若有人提高声音讲出一句有气魄的话来，周围的公民就会投以不信任的眼光，把他当作一个煽动分子。

巴黎到处是警察，这些幽灵，这些令人憎恶的家伙，搞得巴黎迟钝呆滞，使它不能采取任何共同行动。

这不是怯懦，当然不是。从 9 月 4 日到 5 月 30 日，巴黎人民证明了他们能够作出令人何等崇敬的努力，他们表明，在一连串前所未闻的挫折和背叛面前，任何艰巨的任务也不能使他们望而却步。

然而，专制制度最可憎恶之处就是它离间公民，使他们互不往来，互不信任，彼此猜忌。

谁也不再活动，因为谁也不再信任他周围的人，于是出

现了这样奇怪的现象：由一个个勇敢的、准备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的人组成的人群，行事却畏畏缩缩。

这就是 9 月 3 日晚上巴黎的精神状态。

可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一大队人，数目比我以前见到的任何一次都多，也显得更为坚决。各阶级和各种年龄的人汇集在一起了。这说明，全城的居民都行动起来了。

在人群中，可以看到有产者、工人、妇女、儿童、老人、别动队和几名穿着军装的国民自卫军。

毫无疑问，起来反抗的是整个巴黎。

人们异口同声地喊着：废除帝制！

人行道上为数众多的行人鼓掌欢呼。

就这样，队伍一直走到吉姆纳斯剧院，突然，队伍停下来，人们不再呼喊，并潮水般地后退，接着是可怕的溃散。

原来是蓬努凡尔大街哨位上的几个市警把子弹推上了枪膛。

尽管有几位坚定的公民努力稳住人心，但是，惊慌逃奔的人群已经无法阻止了。

我被逃奔的人群挤翻在一辆停在吉姆纳斯剧院人行道边上的出租马车底下，当我从马车的另一侧钻出来时，我发现自己只身一人站在一队市警当中，他们手里拿着剑，象一群狗那样追趕着已经跑远了的丧魂落魄的人群。

不过，还是有一大群人跑到了剧院门口，密密麻麻地站在台阶上，夹杂在幕间休息时走出剧院的观众当中。

一名别动队员——起先我并没看见他——朝这群人奔来，想找一个藏身之所；正当他抬脚踏上台阶时，一个资产阶级装束的人紧贴着他的身子朝他开了一枪。

这位可怜的年轻人当胸中了一弹，一声未哼就张着双

臂仰面倒在地上。

没有一名警察回过头来瞧一眼，他们继续追赶；尸体就这样躺在那里。

开枪的人是一名市警警官；我想，这桩无缘无故、不事声张地犯下的杀人罪，就是帝国的最后一件德政了。

帝国以杀人开始，以杀人告终。

正在这时候，一名市警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低声对我说道：

“先生，走开，别在这里找死！”

这句话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向他们下达的命令是什么；这证明，死到临头的帝国还在想着杀人。

要重演12月2日的惨剧，它手头只缺士兵。

大约一小时之后，一个身材高大、上唇没有胡子、两颊长着鬓毛的人走进马德里咖啡馆，他要求大家安静，以便宣布一件重要消息；接着他就讲了以下这段话：

“诸位，我是茹尔·费里的兄弟。我以他和整个左派的名义到这里来告诉大家，立法院正在举行夜间会议，左派议员此刻正在要求废除帝制。因此，请各位都到立法院去，尽可能多招呼一些人去。人民应该在那里支持他们的代表。”

这位先生的举止和言辞实在可笑，哪能半夜十一点钟到大街上的咖啡馆里召集人民去进行革命行动呢！

人民并不在这里，至多只有百十来个人跟着这位演说家走了。

这件事只能证明，茹尔之流的左派极端害怕被八里桥①

① 八里桥，法国将军，原名古赞·蒙托邦，1860年参加英法联军侵华战争，在北京附近八里桥率军击败中国军队，因此被法皇路易·波拿巴封为八里桥伯爵。——译者